



近日，印度及其鄰國疫情急速惡化，全球疫苗的生產與供應更顯不足。在現時全球疫苗極度緊缺的情況下，香港實屬幸運，疫苗供應十分充足且種類豐富，港府應該繼續加強疫苗接種宣傳，鼓勵更多市民積極打針，切勿白白浪費稀缺且寶貴的疫苗資源。

放眼全球，香港是極少數能完全滿足所有居民接種新冠疫苗需求的地區，縱然如歐美，疫苗供應量都一直處於捉襟見肘狀態，更何況眾多發展中國家乃至貧窮國家地區更難獲得疫苗。各國正在激烈搶購疫苗或開始自己生產，而香港疫苗卻好似多到「無用武之地」。港府早已提前採購了逾2200萬劑新冠疫苗，是全港總人口的3倍，即只要符合打針

提升疫苗接種率是當務之急

要求的16歲或以上市民隨時都可以預約接種，市民更可以自行選擇接種科興或復必泰。然而，從香港持續低企的接種率來看，市民似乎並不「買帳」。

自2月26日正式啟動新冠疫苗接種計劃至今已逾2個月，本港接種率依然低企。目前全港已接種第一針和第二針疫苗的總人次逾177萬，佔全港總人口逾兩成。毫無疑問，香港打針速度已落後許多發達國家，距離達到全民免疫標準更是遙遠。港府早前已陸續提出多項疫苗接種誘因，包括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社交距離，推出「疫苗護照」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商討通關，港星旅遊氣泡也即將啟動，但以上疫苗激勵措施效果並不如預期強烈，近期香港打針速度依舊緩慢，特別是有民調結果顯示市民的打針意願依然不高。面對疫苗接種緩慢的困局，港府須仔細考量，尋找更能提高市民打針意願的途徑。

若有效解決市民不願打針的疑慮與困惑，首先就須釐清為何市民接種意願不高。從香港實際情況來看，本地疫情逐漸穩定且趨向清零尾聲，因此許多市民並無通過打針來保護自己或家人的急切需求；政府利用疫苗氣泡放寬限聚令也並無很大吸引力，因為抗疫一年多，很多市民已經習慣了疫下的限制生活。既然以上誘因無效果，政府就應着重提高「疫苗護照」的吸引力，港人喜愛外出旅遊，一個新加坡並不足夠，港府應該積極擴大「疫苗護照」的適用範圍，特別是多與港人熱門旅遊目的地接觸商討，比如內地、澳洲、新西蘭等，如此才能激勵更多市民打針。而港人不急於打針的另一因素

則在於擔憂疫苗副作用，想再「等等看」，港府需要多想辦法釋除市民的疑慮，比如請專家或專業醫生多發聲，且用通俗易懂的話語向市民解釋疫苗的保護效用，特別是市民關注的疫苗注射異常事件，多用科學、證據、事實說話，澄清與疫苗接種並無直接關係。接種疫苗後發生異常事件或一定副作用實屬正常，港府可收集全球各國疫苗注射異常事件比例，把解說工作做得更有針對性，以此緩解市民的擔憂。

疫苗接種關乎香港經濟復蘇及社會生活交往能否完全復常，面對始終緩慢的打針速度，提升疫苗接種率是當務之急，港府宜提供更多的誘因鼓勵接種，盡早促成群體免疫。市民為己為人為香港，亦應積極打針。

香港商報評論員 趙燕玲

教協是教育政治化的罪魁禍首

何子文

教協日前發表調查，指約四成受訪教師有意離開教育界，當中近兩成人計劃辭職或提早退休，教協並指有關人等離開是基於「政治壓力日增」云云。數字當然駭人聽聞，但原來有關調查主要訪問教協會員，但回覆人數只是1178人，有關結果正是在這千多人中得出的。

教協有9萬多會員，進行的民調卻只有千多人回覆，回覆率極低根本反映不了真實情況。而且，會回覆的主要是什麼人？主要就是一些立場較為鮮明以至極端的人，相反絕大多數教師根本沒有興趣回覆教協這樣的一個調查。試問調查結果怎可能如實反映情況？

所謂民調帶有政治目的

教協嘩眾取寵的民調結果公布後，教育局隨即反駁，指有組織在網上開展問卷調查，其樣本與業界人數相差極遠，未有列明調查的取樣方式、回應率及核實身份機制等，局方未能評論調查的代表性及可信程度，提醒社會人士，要小心考慮，以避免被人誤導。教育局並指每一學年教師的流失人數均有一定的浮動，屬常見現象，每年的全港教師調查，教師流失率維持穩定。

教育局的回應正指出了教協的調查，不但不科學、不合理、不準確，更是政治掛帥，別有用心，尤其是

教協將教師離職歸咎於所謂「政治壓力」。從邏輯上講，一般教師課堂授課，請問會有什麼政治壓力？教授中英數、文科理科的教師，又何來什麼「政治壓力日增」？而且，教師流動本屬正常，教協進行這樣一個民調，根本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就是借民調指摘政府向教師施加壓力，從而挑動民情，抵制政府在教育界推動國情教育、國安教育。

然而，在學校推動國情教育、國安教育天經地義，各國包括英美國家都有推行，難道這些教師都面對所謂「政治壓力」？顯然，這樣的民調結果並不公道，更是有失偏頗，但教協卻藉此大做文章，正正反映教協才是教育政治化的罪魁禍首，也是香港教育亂象的根源。

教協捨棄專業違反初心

自從違法「佔中」及修例風波以來，本港教育亂象愈來愈引發社會各界關注。教協是一個由香港的大學、中學、小學、幼稚園各級學校教師組成的工會，既是一個教育專業團體，也是一個為教師爭取權益的工會組織，亦是一個社會團體。這個「三位一體」的特點，讓教協成功吸納大批教育界人士加入迅速壯大。雖然教協是「三位一體」，但其根基始終是維護教師的專業，這才是教協成立的初衷，沒有這些，教協不過是一個反對派政治組織而已。

教協成立是維護教師的專業和權益，而不是為某些政治勢力作打手，教協及其會員當然可以有政治立場，但如果教協因為政治目的，不惜捨棄專業，將教師推上抗爭前線，讓大批教師因為觸碰紅線而前程盡毀，這樣背棄初心的教協還有什麼存在價值？教協妄稱教育界承受巨大「政治壓力」，但實際上教協才是香港教育政治化的罪魁禍首，一直打着教育專業的旗號將教育政治化，對於這樣失德的教協，還應該繼續坐視其在教育界煽風點火嗎？

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是全球趨勢

國際視野

趙汝林

上周，本港九巴和龍運兩家巴士運營公司宣布了一項宏大的環保計劃，兩家公司將在今年底之前為全港巴士車廠、巴士站和巴士車頂安裝超過22000塊太陽能光伏發電板，以利用太陽能供電子車廂冷氣系統及抽風機，安裝完成後每年將可生產超過1000萬度的可再生能源，可為香港減少大約5400噸碳排放量。這是香港公共交通運輸界最大的一次減排環保行動，既響應了港府鼓勵使用清潔及可再生能源的減碳政策，同時也是適應現時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趨勢。

近年來，國際社會對於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關注度愈來愈高，各國也紛紛採取措施來緩解氣候變化問題，2016年簽署生效的《巴黎協定》是全球攜手合作解決氣候危機的里程碑；上月，重返《巴黎協定》的美國召集多國召開了全球線上視像氣候峰會，包括中國、俄羅斯、英國、日本、加拿大、韓國、澳洲等在內的4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參與了此次會議，並且做出了明確的減碳承諾。美國總統拜登在會上承諾：到2030年時美國的碳排放量將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至少50%；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承諾中國將力爭於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即二氧化碳淨零排放，從2026年到2030年間，中國的煤炭消費將逐步減少；此外，日本在會上亦宣布將該國的減排目標從2013年的26%提高到46%。

由於各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及情況不同，難以達至統一的減排目標和時間線，不過從不同出席會議的誠意和領導人級別及規格來看，緩解氣候變化和減碳環保必然將成為許多國家的重要關注點和政策傾斜方向。就在視像氣候峰會召開前夕，中美兩國儘管在政治經濟和科技多領域仍存在激烈分歧與矛盾，卻就氣候變化合作達成了共識，雙方更發表了聯合聲明表示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致力於相互合作。兩大經濟體攜手共同解決氣候危機，這對全球環境及環保政策都將產生重大影響。

未來新能源將日益普及化

隨著多個國家紛紛訂明明確的減排目標和時間線，開發和使用清潔能源或可再生能源來取代傳統化石燃料將成為未來主流發展趨勢。可以預料，當新能源生產技術逐漸成熟且價格成本不斷降低，以電能、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等為代表的新能源將被更廣泛使用，甚至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逐漸普及化。比如近年特斯拉生產的新能源電動車愈來愈被消費者所接受和追捧，其股價和市值更不斷創新高。而內地幾大互聯網巨頭和車企亦陸續啟動了造車計劃，似乎也預示着未來新能源的日益普及化。

新能源經濟已成為市場追逐的熱點和下一個風口，本港自然也應該及時跟上發展步伐。不僅政府要出台更多政策鼓勵使用新能源及發展新能源經濟，業界也須抓緊機會，九巴和龍運大規模安裝太陽能發電板就率先邁出了重要一步，極具前瞻性策略和眼光。

邁出司法改革積極一步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參政議政

葉建明

司法機構日前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提出改進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機制，建議引入兩層架構，提升機制的問責性及透明度。第一層專責的法官小組會調查性質嚴重、複雜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個案；第二層由法官及首次引入社會人士組成投訴法官行為諮詢委員會，會就投訴的處理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出意見。

市民樂見司法改革

引入兩層架構處理相關投訴個案，可以視為司法機構回應民衆對司法改革願望邁出的積極一步。改進的投訴機制立足於香港基本法原意，既確保司法獨立的原則，又引入社會人士參與，加強對法官和司法人員的監督問責，避免司法權被濫用，打破司法機構為人質疑的「自己查自己」、不受外界監督的框架，提升司法機構的透明度及問責性，有助於提升民衆對司法機構的信心，是市民所樂見。

最近幾年，香港法院面臨諸多政治性爭議，法官判決屢屢引發質疑，公衆對法官和司法人員的投訴量顯

著上升。據司法機構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2020年有5559宗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投訴已獲完成處理，當中包括5488宗內容相同或類似的大量投訴。由於現行司法機構實行封閉式的投訴監督機制，法官投訴程序由各級法院領導一人處理，例如總裁判官處理其他裁判官的投訴，首席區域法院法官處理區域法院法官的投訴，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處理上訴庭及原訟庭法官的投訴等，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則處理其他終審法院法官及上述法院領導的投訴。此舉被稱為「法官查法官」，社會上質疑的聲音強烈，也引發強烈的司法改革呼聲。

香港司法改革的方向

香港司法改革要不要進行、如何改革，已經爭論了一段時間。社會有普遍共識的是，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是香港賴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保障香港的法治優勢，是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但是，任何制度和機構不可能永遠一成不變。司法的與時俱進，不斷檢討並改革，才能保障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司法改革與保障香港法治優勢不僅不衝突，相反，目標是一致的，都是令香港法治基礎更穩固，更能實現人們追求的公平正義，給市民以信心。

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回歸24年來司法中出現的一些

問題，將司法改革推到不能不改的位置。且不說涉港人內地生子女居港權的「吳嘉玲案」「雙非兒童」莊豐源案、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等對香港影響深遠的案件，就2014年佔中以來，香港在「社運」中不斷出現暴力等嚴重違法案件，令一些法官因政治立場等問題，出現專業判斷偏差甚至雙重標準，不僅判決結果有明顯的傾向性，更用社會無法接受的溢美之詞誇讚違法者「優秀」，令法官裁判案件的公信力受到極大損害。有法律學者曾表示，法治原則能否實踐，不僅取決於機構設計和法律規則，也取決於個人的專業水平、職業操守和品格。因此，改進法官司法人員投訴機制，是對法官和司法人員監督問責的必要之舉，這必有助於捍衛香港法治的崇高價值和聲譽。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成為「一國兩制」憲制框架下的特別行政區。雖然根據基本法，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維持基本不變，但香港司法系統以及法官和司法人員應該主動維護回歸之後已經變化的憲制秩序，充分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令香港的司法與「一國兩制」制度相適應，法治更完善、更健全。這應該是香港司法改革的方向。

法院是司法權運行的主戰場，法官是司法權力的實際運用者。改進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機制，順應香港社會需求，將法官運用司法權力放到陽光下運行，增加外部力量監督，值得肯定。我們期待新的改革舉措陸續有來，令香港的法治招牌繼續閃亮。

設母嬰健康醫療券添效率

觀塘區議員 顏汶羽

香港脈搏

現時，懷孕媽媽及初生嬰孩均會按期到母嬰健康院檢查，但隨着出生率下降，相關的需求已比二三十年前少得多。在母嬰健康院，每天大約處理三四十宗檢查，但由登記至見護士，要等候30至45分鐘，見護士不足10分鐘，等醫生病假紙等候45分鐘。在等候期間，亦不見得醫護人員忙着一個接一個地見面做檢查，連清潔姐姐也空閒得自行量血壓，順便也檢查一番。

在母嬰健康院，與其他公營普通科門診或專科門診一樣硬件設施不缺，人手亦足夠，關鍵是效率較低，令輪候及等候時間日漸增加。低效率令社會出現耗費，數十市民在健康院等候超過3小時，但實際應診只不過是15分鐘。

要處理效率問題，便要引入市場機制。我倡議政府向所有懷孕的香港居民提供2萬元及向每名初生嬰兒提供1萬元的母嬰健康醫療券，讓所有母嬰在私營機構接受母嬰檢查及相關的治療。每年大約4萬新出生嬰兒，即大約開支為12億元，但政府可以節省31間母嬰健康院及部分產科的服務。按我推算，省回的開支應

比12億為多，可以令母嬰健康服務更具效益。

另一方面，母嬰使用母嬰健康醫療券可以在私營醫療機構獲得不低於現時母嬰健康院的服務，母嬰亦可自己「加錢」以獲得更好的服務、檢查及治療，如孕婦超聲波檢查、T21產前篩檢等。現時，有部分孕婦在公私營醫療機構同時檢查，實際上是有點重複及資源損失的，若使用母嬰健康醫療券的話，孕婦便能更好地使用母嬰健康醫療服務，政策的效率定能提升。

對公營醫療機構來說，在醫療券「錢跟人走」的概念後，服務及效率定會提升，以競逐顧客。同時，因醫健通的設置，母嬰的醫療紀錄及相關資料已可在不同的公私營醫療機構中使用，進一步提升資訊流動，加多市民內的競爭。

要改善公營醫療體系的效能，必須做好公私營醫療分工，為公營醫療體系瘦身，將大部分的醫療服務交由私營醫療系統處理。這既是平衡公私營醫療發展，亦是同時增加兩者的效率，改善公營醫療系統的缺點，公帑的使用更有效益，更重要的是為香港市民提供更具水平的醫療服務。

